



培根的解释学思想论纲

黄小洲

摘要: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要归功于培根,他对西方现代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培根有系统的解释学思想,其意义不容忽视。不是玷污、虐待、中伤自然,而是重新发现、完美、提升自然,是培根解释学的重大贡献。自然解释学需要一整套客观公正、可靠准确和循序渐进的方法论来深入自然。培根在自然解释中奉行的是客观主义或冷漠主义,可是在人文主义的解释学领域中则充满了人道主义、幸福主义的温暖色调。培根的神学解释学策略是:让神学与哲学互相分离,互不干涉;表明理性的地位始终低于信仰;使科学探究与上帝的话语《圣经》相协调。

关键词:培根;解释学;自然;方法论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2.004

收稿日期:2021-03-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黑格尔与现代解释学关系研究”(15XZX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小洲,男,广东茂名人,哲学博士,德国海德堡大学访问学者,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与解释学,E-mail:hxzh81@163.com。

17 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的创始人弗兰西斯·培根与西方解释学的发展有关联吗?这不仅对于培根研究而且对于西方解释学研究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洪汉鼎先生虽然已经创造性地在《诠释学》中独立一节论述斯宾诺莎基于自然解释方法的《圣经》解释方法^①,但遗憾的是没有论及自然解释方法的创始人培根。西方有着历史悠久的解释学传统,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这些公认的解释学大师都有一部自己独特的西方解释学史。培根的解释学思想需要借助现代解释学的崭新视域才能被发掘出来,其实,这个工作狄尔泰与伽达默尔已经有了伏笔。

西方现代解释学的创始人之一狄尔泰,在其奠基之作《精神科学导论》一书中开篇就谈论培根著名的《新工具》及其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与方法方面产生的巨大效应,并且在第二编中不遗余力地阐发欧洲科学的兴起。这绝不是狄尔泰的偶然之举。作为西方解释学的核心哲学家伽达默尔在追溯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史时指出:当代“解释学”(德文 Hermeneutik/英文 Hermeneutics)这个词的使用是随着现代方法概念和科学概念的产生而使用的^②。而现代科学方法论思想的诞生恰恰要归功于培根,笛卡尔紧随其后。国际著名的解释学专家格朗丹说:“确切地讲,在培根与笛卡尔之间,hermeneutica 这个新词被创造出来了,尤其是在试图补充和革新以前的工具论方面。”^③因此,从效果史或影响史来看,培根应该在西方解释学历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本文试图在现代解释学的视野中重构培根解释学思想的基本论域,给出一个论纲,以便人们对其基本轮廓有一个纲举目张的综合性把握。

①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4 页。

②Hans-George Gadamer, *Hermeneutik II: Wahrheit unde Methode-Ergänzungen Register*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3), 93.

③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82 页。

一 自然本体论的解释学

“自然”是培根解释学思想的核心与根基,并在其解释学思想中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培根划时代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书所拟定的副标题就是“自然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现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培根对“自然的解释”实质意思是“如实阅读大自然之书”^①。“自然”是一部无字之书。

“人作为自然的统治者(minister)和解释者(interpreter),他所能做与所能理解的正如他对自然秩序(the order of nature)的观察(observations)所允许他的那样多,这种自然秩序或者是针对事物(things)的或者是针对心灵(mind)的;除此而外,他既不能认识更多,也不能更有作为。”^②培根在《新工具》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如是说。

然而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旧时代里,人是上帝的造物,他生存的基本任务就是理解和解释上帝的话语。基督教神学大师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向上帝倾情忏悔人类的渺小与罪恶,并赞颂上帝的伟大与智慧。中世纪神学台柱阿奎那则通过煌煌巨著《神学大全》条分缕析、长篇累牍地诠释作为上帝话语的《圣经》。应该说,在基督教神学的传统观念中,一切赞美都归于上帝,上帝才是解释学围绕的唯一中心,自然则是卑微丑陋的,根本不值得研究。但是,培根的上述说法则颠覆了这一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主张,他把哲学研究的中心从神学解释转移到自然解释上。这个自然解释学主题的确立标志着西方解释学发展的重大转变,即传统神学解释学的衰落与自然科学解释学的兴起,它同时也标志着西方哲学现代范式的诞生。哲学中心主题的转变绝对不是小事情。培根的自然解释学吹响了时代精神转换的号角,自然取代上帝、科学取代神学、哲学取代迷信成为时代的新方向。

“自然”其实并不卑贱。培根主张上帝创造了两本大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自然之书。理解《圣经》,需要神学解释学;理解自然,则需要一门自然解释学。显然,培根是想借助上帝的权威来提高自然探究的地位。不仅如此,培根还表明自然是精微奥妙的,它比人类的感官(Sense)和理解力(Understanding)都要玄妙高远。因此,解释自然同解释《圣经》一样是一个神圣的工作,而且它绝不是一件轻轻松松的工作,需要人们十分专注认真与严肃谨慎。在培根这里,自然甚至有取代上帝地位的倾向。

用自然来解释自然,而不是用神或奇迹来解释自然,是培根解释学的伟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培根可谓西方近代版的泰勒斯。不是玷污、虐待、中伤自然,而是重新发现、提升、完善自然。培根的自然解释学与古代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相接近。据黑格尔考察,自然哲学与一般自然科学有一种独特的关系,因为自然哲学本身就是物理学,即理性物理学^③。只是到了近代,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才逐渐分离开来。因此,自然解释学、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三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不过培根突出主张,自然哲学是科学的伟大母亲^④。这为从哲学上把握各门自然科学留出了地盘。就这点而言培根是十分崇古的。然而,培根却又一反古代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法,把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归入自然哲学的名类之下,这就使得培根的自然解释学不仅具有科学研究的特征,同时也具有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特征^⑤。

培根这种自然本体论的解释学路径在西方解释学史上有着革命性的深远影响。如果我们像汉语的解释学史那样承认斯宾诺莎有一种解释学,那么斯宾诺莎则比培根更彻底、更激进地颠覆了西方基督教会传统的解释学,即他竟然用“自然”来解释神。“解释《圣经》的方法与解释自然的方法没有大的差异。事实上差不多是一样的”^⑥。毫无疑问,斯宾诺莎“神即自然”的革命解释学原则被时人看作是无神论,它触怒了整个西方神学界,但是它却为科学解释学、唯物主义的解释学铺平了道路。恩格斯就说:“当时的哲学博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

①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② *The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Works of Lord Bacon*, ed. Joseph Devey (Lo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904), 383.

③ 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页。

④ 培根《新工具》,许宝骥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⑤ M. 普里麦克《对培根哲学的重新解释(大纲)》,余丽嫦译,《哲学译丛》,1980年第6期。

⑥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8页。

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并把细节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培根的自然本体论解释学才是这种思潮的发端者。

众所周知,狄尔泰曾区分“说明自然”与“理解精神”,即自然科学靠“因果说明”,而精神科学则靠“同情理解”,因此解释学才是精神科学的基础。从表面上看,自然科学似乎不需要解释学,实则不然。波普尔就主张:“科学的目标就在于找出我们认为需要解释之事的令人满意的解释。”^②狄尔泰的时代与培根的主张截然不同,神学不再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主宰,人文科学衰微,自然科学则异化成为新的话语霸权。在一个科学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为了捍卫精神科学的独立性和真理性,狄尔泰既反对培根的自然主义,又深深地依赖这种自然主义。这是一种矛盾。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早就指出,狄尔泰虽然为精神科学辩护,但是又深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伽达默尔曾多次强调解释学的普遍意义,这就证明解释学应该包含自然科学解释学,同时解释学也应该涵盖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不同向度。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通过他那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向世人证明,解释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是起作用的。

二 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解释学

自然虽然时刻都能触手可及,但是它与我们生硬地对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团。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自然喜欢隐藏自己^③。看起来,自然就像古代埃及伊西斯女神一样蒙着神秘的面纱。尽管培根确立解释学的主题或对象是自然,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自然?即如何揭开自然的神秘面纱?

培根的答案是:自然解释学需要一整套客观公正、可靠准确、普遍适用和循序渐进的方法论工具,即经验归纳法来确定自然的规律、秩序、精度与广度。黑格尔指出,作为英国现代经验论的首领、西方实验哲学的鼻祖和科学归纳法的创始人,培根有理由万古留名^④。因此,经验(Experience)、实验(Experiment)和归纳法(Induction)就可以构成培根解释自然最有效、最著名的方法论体系。我国培根哲学研究专家余丽嫦也说,“培根把方法论问题作为他的哲学的首要问题”^⑤。显然,在培根这里,任何真理或知识的得出都要遵循普遍客观的科学方法论,反之,缺乏正确的方法论保障则无真理可言。这就使得西方现代的自然解释学与认识论、方法论之间结下了铁一般的联盟。

在《新工具》的序言中,培根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他的方法论程序:以直接简单的感官知觉为认识的起点;排斥大部分随感官活动而引起的心灵想象;在校正的帮助和防护下,保留感官的验证作用;通过恰当的逻辑工具为人类心灵建立理解力循序渐进的阶梯^⑥。我们可以把这些方法论步骤合称为“广义的归纳法”,而把其中的逻辑工具即著名的“三表法”、排除法和正面解释法称为“狭义的归纳法”。

不可否认,培根深知人类的感官知觉是有缺陷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把感觉经验视为科学真理最重要的源泉和检察官,只要给予足够的帮助,它是能够贡献出无穷多知识财富的。所有的经验都要还原为人类最原初、最简单、最直接、最朴素的感官知觉。因此,我们把这称为自然科学的感觉经验,以区别于神学信仰的天启经验或文学艺术的想象经验。哲学和科学本身都要求有论证。培根说:“如果它遵循实验事实上所做的,那么经验就是目前最好的证明。”^⑦关于感觉经验与实验的差别,培根的解释是:“这种经验,如果是自行出现的,就叫作偶遇;如果是着意去寻求的,就叫作实验。”^⑧可见,实验就是经过心灵设计、有意为之的一种独特经验。自然的奥秘大多是通过实验才被逼问出来的。培根的归纳法也可以被称为经验归纳法或实验主义的归纳法。

追求科学真理,光有感觉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培根十分明白人类的理解力不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干燥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70页。

② 卡尔·波普尔《实在论与科学的目标》,刘国柱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页。

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页。

⑤ 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

⑥ 培根《新工具》,序言第2页。

⑦ *The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Works of Lord Bacon*, 406.

⑧ 培根《新工具》,第60页。

之光,它容易受意志、情绪、迷信以及各种偏见的影响而潮湿发霉。因此,清除这些偏见或障碍,保护人类理解力之光干燥纯正,这是通达自然真理的必经之途。这就是培根闻名遐迩的“四假象说”。为此,他给出了一条清除偏见的金规则:“一般而言,凡是沉思自然的人,都应该对具体地占据和固化你理解力的任何事物加以怀疑(suspect),并且应该更加小心谨慎地保持理解力的心平气和与毫无偏见。”^①显然,这是一条像利科所说的怀疑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一条客观主义的理性均衡原则。我们把培根这里的方法论步骤称为“怀疑主义的归纳法”、“否定性的归纳法”或“消极的归纳法”。

解释自然就是要从事物的性质中发现其形式(Form)。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四因说当中,培根最重视形式因而最排斥目的因,形式因构成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解释学的基础。他说:“形式的发现产生真正的理论和自由的实践。”^②如何发现形式,这就是培根狭义归纳法的内容,又被称为“真正的和合格的归纳法”、“解释自然的真正钥匙”或“积极的归纳法”。首先实施的步骤是著名的“三表法”,接着实施“排除法”,即淘汰事物性质的非本质规定,最后对事物的形式作出正面的初步解释,这才算走完一个圆圈,获得初步的成功。培根把这称为“理解力的放纵”或“解释的开端”。

应该说,培根的自然科学归纳法造就了一个普遍追逐方法论技术的时代,它使得西方解释学萌生了一种普遍方法论的觉醒。潘德荣先生指出:“这种与自然密切联结的科学思维方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种新的科学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渗透到了各个研究领域。……尝试将诠释学建造成有别于解经学、而类似自然科学方法那样的精密、客观的方法论学科,亦即一套普遍适用的诠释规则体系。”^③通常,我们把丹豪尔在1654年出版的《圣经解释学或圣书文献的解释方法》视为西方解释学史上第一部在书名上使用“解释学”这个词的著作。其实,丹豪尔可以被视为施莱尔马赫普遍解释学设计的先驱。1757年,迈尔(Meier)就已出版《普遍解释技术试探》一书。当然,施莱尔马赫有理由批评前人的解释学还不是普遍的解释学,而只是特殊的解释学。他把自己的心理解释方法,也称为一种技术的解释方法。狄尔泰反复申述解释技术、规则系统或正确解释程序的重要性,他认为,所谓阐释(Auslegung)或解释(Interpretation)就是对生命表现的合乎技术的理解^④。

由此可见,在培根的影响下,西方解释学进入到一个科学方法论意识全面觉醒的时代,时代精神的主流是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楷模,炮制出一套普遍适用的解释学方法论。崔永杰先生认为,虽然伽达默尔对培根的方法论思想“不屑一顾”,但是对其方法的精神十分赞赏^⑤。何卫平先生亦指出,以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代表,西方解释学正在经历第三次转向,即转向存在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相结合的解释学,这是一次在更高层次上向狄尔泰的回归^⑥。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当代解释学回归狄尔泰,其实就暗含着向培根自然科学方法主义解释学的“重返”。托马斯·库恩说:“一个科学家必须致力于理解世界,并扩展这种使世界有序化的精度和广度。”^⑦可见,理解培根哲学对于明了日后西方解释学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 人文主义的实践解释学

除了自然科学的纯粹理论领域,我们还应该看到培根在人文科学中的实践解释学方面的贡献。与自然解释学领域压制目的因不同,培根在人文社会领域重新恢复了目的论解释的效力。解释自然是为了支配自然,自然领域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人类的生活和幸福,要以对人的实效和功用为旨趣。如果说培根在自然解释中奉行的是价值中立的客观主义或冷漠主义,那么在人文主义的实践解释学领域中则充满了人道主义、幸福主义的温暖色调。这从某种程度上舒缓了自然研究对人本身的逼迫,科学技术的异化问题还不是培根时代的主题。培根明确主张:“科学真正的与合法的目标,是将新的发明和财富馈赠给人类的生

① *The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Works of Lord Bacon*, 397.

② *The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Works of Lord Bacon*, 449.

③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④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⑤ 崔永杰《“全面发展的萌芽”:培根思想管窥》,《哲学研究》2001年第8期,第42页。

⑥ 何卫平《西方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从哈贝马斯到利科》,《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45-62、205页。

⑦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35页。

活。”^①不仅如此,实际上,事功和实利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实验科学的发展。为此,培根严厉批评沉迷于思辨的古希腊人和执着于空洞形式争论的经院学者,指责他们没给人类生活带来效用和益处。

人类在自然领域中不是恭顺的仆人,而是掌握着强大威力(归纳法)的主人。只有通过解释自然,人才成为自然的主人;只有对自然实施改造和统治,才能使自然为人类自身服务。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因偷吃智慧之果而堕落,失去原初的天真状态,不得不汗流浹背辛苦劳作才能吃上面包。可是培根认为,通过科学和技术,人类可以从对自然万物的统治权中得到补救。可见,自然解释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自身的解放,使之从奴仆状态中解放出来。“真理和功用在这里乃是一事”^②。就此而言,培根可谓欧洲现代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鼻祖。培根的这种解释观在道德、经济与政治等实践哲学领域中极大地冲击了欧洲传统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世俗主义的地位。培根论证说,西方历史上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家都会给予至高的神圣尊荣(神人),至于对国家有功的开国者、立法者或将军等,只不过得到英雄的尊号(圣人)。他认为古人的做法十分公正,因为“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仅及于个别地方;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不朽千秋”^③。他甚至认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对于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超过了任何帝国、任何教派和任何星辰。

一般来说,欧洲现代历史意识的崛起与古今之争的大讨论,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欧洲的人文学术,而且对于促进西方现代解释学学科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通常我们都把意大利的维柯视为西方现代历史哲学的创始人,而把17世纪末法国文学界掀起的古今之争视为正宗。其实,培根才是欧洲现代第一个最富历史感的哲学家,他最先在哲学中挑起了古胜今还是今胜古的大争论,在这点上他与笛卡尔截然不同。

我们知道古希腊人是反历史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诗比历史更真实”最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甚至笛卡尔也是反历史主义的。培根则不然。他在1605年左右就把人类的知识区分为三类,并且分别对应于三种人类的理解能力:历史(记忆力)、诗歌(想象力)和哲学(理性能力)。这是历史学科在西方现代首次以一种严肃的身份进入到哲学的讨论中来,并且成为知识的一个门类。培根进一步把历史区分为自然史、社会史、宗教史和学术史。每一个领域又可以作更细致的划分,例如生物史、奇异史、技术史、回忆录、档案、古代逸史、编年史、传记、纪事、教会史、预言史等。不仅如此,培根还亲自撰写历史著作《风的历史》、《自然史》、《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大不列颠史》等,涵盖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培根在历史领域的前瞻眼光和率先示范,足以开启西方现代历史主义之先河,为后来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解释学的思考开垦了田地。当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耗费大量笔墨来论述从兰克、德罗伊森到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思想时,历史反思实际上成为了现代解释学诞生的重要媒介。为了对抗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兰克强调历史的客观主义取向,即进入历史,我们必须忘却自我。兰克的这种立场与培根是高度一致的。

与此同时,哲学领域古今之争论题的形成也加速了历史意识的觉醒。培根明确地把自己的学术事业看成是超越古人的竞争。他反复强调古希腊人其实并不“古老”,从世界历史的眼光看,他们应是人类的“天真儿童”,理解力还没有成熟,行动上也未获解放。在培根看来,到他的时代为止,西方经历了三次学术革命:第一期是古希腊学术,第二期是古罗马学术,第三期就是他所处时代的学术^④。中间经院神学和阿拉伯学术都未达到学术革命的层次,而培根把自己时代的学术直接与辉煌的古希腊罗马并驾齐驱。他甚至声言,如果我们加倍努力,那么学术上的第三次大繁荣就有可能超越希腊和罗马的光荣^⑤。从培根起,后来很多西方哲学家审视自身的学术时开始带上了历史、发展、进步的眼光。这种历史主义的古今之争,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得到了格外重视,它至今仍然是解释学研究中的重要论题。

与笛卡尔厌恶修辞学不同,培根充分肯定修辞学对于学术的重要意义,并且将古代解释学的寓意解释方

① *The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Works of Lord Bacon*, 416.

② 培根《新工具》,第98页。

③ 培根《新工具》,第102页。

④ 培根《新工具》,第56页。

⑤ 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称修辞学是一门很卓越的学科^①。修辞学是一门说服众人的艺术,它要在高深知识与普罗大众之间充当中介,进行翻译和解释。最前沿的自然科学知识通常只有少数人能懂,如果它要使大众理解,那么必须运用修辞学。修辞学一般会用寓言、比喻、类比或格言来说服人。例如,培根把古希腊的神祇潘(Pan)寓意为大自然,女妖塞壬(Siren)的寓意是享乐的邪恶诱惑^②。这表面上是在赞美古人的智慧,实则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新工具》采用格言体来写作,著名的四假象说就是修辞学的比喻。另外培根把自然比作上帝之书,把知识比作光,把人的心灵比作镜子,把实验家比作蚂蚁,把推论家比作蜘蛛,把采用归纳法的人比作蜜蜂等。伽达默尔曾指出,寓意解释方法是西方古代解释学的核心。显然,培根并没有抛弃这个传统,而是加以灵活的改造。由此,我们可以把培根看作是衔接古代修辞主义解释学传统的重要桥梁。我们知道,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伽达默尔,他们都特别强调解释学在起源上与修辞学的紧密联系。

四 理性主义的神学解释学

如何处理神学信仰,即如何协调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这是培根时代思想家们绕不开的问题,涉及西方历史最悠久也最正统的神学解释学。既然培根把科学的伟大复兴当作自己毕生的使命,那么他必然要使哲学或理性的地位提升上来。但是从现实的历史经验来看,学者往往成为异教徒,学术昌明往往使人倾向于无神论。为此,培根的神学解释学策略就是:让神学与哲学互相分离开,互不干涉;表明理性的地位始终低于信仰;使科学探究与上帝的话语《圣经》相协调。这是理性主义的神学解释学与明显的双重真理说,即不因自然解释而否定上帝之言,给信仰腾出地盘。

显然,如果以哲学来否定神学,让理性超越信仰,那么结果必然导致无神论,撼动宗教的权威。这是培根无法接受的,他曾说无神论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恨的。如果以神学来绝对统一哲学,让信仰指使理性,那么结果则必然是自然科学探索的寂灭。这两方面极端都不是培根想要的,也违背培根的理想。因此,只有让神学与哲学互相分离开来,理性与信仰相对独立,那么他们彼此之间才能和谐协调。宗教神学建立在上帝话语与奇迹基础之上,而自然科学则建立在归纳法的基础上。培根明确阐述人类的理性知识有确切的限度和局限:第一,不要忘记了人的死亡宿命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知识身上;第二,不要抱怨上帝或讨厌神学,我们利用自然是为了人的幸福安逸;第三,不要妄图通过自然解释来窥探上帝的奥秘^③。

神学家批评说,知识就像毒蛇撒旦,渴望知识是导致人类始祖堕落的原因,研究自然使人丧失信仰,背离上帝。培根回应称:“一点点儿哲学使人倾向于无神论,这是真的;但是深究哲理,使人心又转回到宗教去。”^④培根区分肤浅的哲学研究与精深的哲学研究,前者可能导致无神论,但是后者必定是有神论并且赞美上帝的。为此,培根必须重新解释神学理论和《圣经》文本,证明深究哲理与皈依上帝是同一条道路的不同侧面。他说在创世过程中,上帝表现了两种美德:一种是创制宇宙万物的无上权力,一种体现在自然万物美丽形式中的智慧法则。尽管人无法窥视上帝的秘密,但是能够通过解释上帝的创造物即自然来理解上帝的智慧。培根以此区别于后期经院哲学中那种神秘主义、意志主义或激情主义的上帝创世说。他甚至强调,就连马丁·路德也是利用理性来工作从而反抗罗马主教和堕落的教会传统。显然,当路德用“唯有圣经”这一解释学原则来对抗教会权威时,他就把遵从逻辑与语法的字义解释提升了起来,从而为理性主义打开了一丝光亮。培根则把字义解释背后的理性主义、客观主义、普遍主义与逻辑主义发扬光大。我们知道,路德去世后15年,培根出生;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影响极大,培根受其影响是自然的。

在地位次于上帝的天使等级排序中,培根重新解释说,第一位是爱的天使,第二位是光明天使(亦称智慧天使),第三位才是管理天使(分属君主王侯等)^⑤。可见,不仅上帝有智慧,就连在其他神灵中,智慧(知识)天使是排在前列的,显示其重要地位。培根进一步引导说,在上帝的众多创造物中,最先被创造出来的是光,然后才是其他可感的物质自然。培根的新诠释是:“光”是沟通物质自然与无形知识之间的桥梁。换言之,光

①培根《学术的进展》,第129页。

②培根《论古人的智慧(增订本)》,刘小枫编,李春长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③培根《学术的进展》,第5页。

④《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7页。

⑤培根《学术的进展》,第32页。

兼具自然性、智慧性和神圣性^①。

关于人类在伊甸园中的堕落行为,培根也给予重新阐释。他认为亚当在伊甸园中的工作正是知识的主要内容:一是观察万物,二是给万物命名。这些知识并没有导致人类的堕落,真正驱使人类堕落的是分别善恶的道德。《圣经》中记载了很多发明家和制作者的名字,并对他们赞誉有加。例如摩西作为上帝的第一支笔,就是一位满腹经纶的人。培根甚至构想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对象就是古代犹太国王所罗门的科学宫,其中大胆地称“知识为上帝的首要创造”^②。在培根看来,《圣经·约伯记》是诗歌,也是智慧书,因为它记载了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例如天文学、生育学和矿物学等。

培根的以上解释工作可以说是消极性的,即论证神学中原来包含有哲学,信仰能够容纳理性,从而缓和二者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但是这样还不够,他还要进一步说明理性能加强信仰,哲学能增进神学。培根宣称,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能够对宗教和信仰起到装饰和美化作用,使人们更有效地赞美上帝,同时又能对无信仰和错误迷信提供预防和治疗作用。这种积极的神学解释学,可以表述为:“按照上帝的话来说,自然哲学实在既是医治迷信的最有把握的良药,同时又是对于信仰的最堪称许的养品,因而就应当被拨给宗教充当最忠诚的侍女,因为宗教是表现上帝的意志的,后者则是表现上帝的权力的。”^③自然哲学不仅不是宗教的敌人,反过来它还是宗教的虔诚侍女。这样的论调过去阿奎那就曾主张过,尽管培根旧调重弹,但其实醉翁之意不在神学,在乎自然科学的振兴。

从形式上,培根把《圣经》解释总结为两类:一类是系统解经学,一类是分散解经学。系统解经学在传统追求三种境界:“一是概括简略,二是坚实有力,三是尽善尽美。”^④可是实际上,人们陷入了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神学中滥用推理推论,离开《圣经》文本越来越远,导致解经质量每况愈下。至于分散的解经学则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整体与部分的循环方法,字面解释与深层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从内容上看,培根还把《圣经》解释分为神秘解释法和哲学解释法,二者都有合理性,不可超出一定的限度。总体上来说,培根的神学解释学方法论原则是:“学习时要忠实”和“学习后会判断”,二者辩证统一。由此可见,培根的神学解释学基本上保留了传统圣经解释学的诸多方法,同时又带有理性主义科学启蒙的色彩,就连20世纪的解经学大师们狄尔泰、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都具有强烈的启蒙意味。启蒙与解释学不是相互隔绝、相互敌对的东西。

五 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培根本人并没有使用“解释学”这个“名”,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培根有相应的解释学思想之“实”。正如中国古人虽然没有使用“哲学”这个词,但是这不能说明中国古人没有哲学。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是一门关于宣告、口译、阐明、解释和理解的艺术,而且首先代表一种具有高度技巧的实践^⑤。如果我们以这个定义来透视培根的思想,那么其中的解释学意蕴就能清晰地显露出来。西方古代最重要的圣经解释学传统在培根那里并没有随着科学启蒙而被遗弃。尽管培根并没有像伽达默尔那样专门就“理解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来探究一门普遍的哲学解释学,但是培根为西方现代解释学的诞生营造了一种科学精神并准备了锐利的方法论武器。

培根在西方解释学史上实现了从基督教正统神学解释学向自然解释学的重大转变,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所创制的经验归纳法为自然科学知识的发明提供了一套普遍有效的方法论工具,它在哲学中产生的巨大方法论效应,为后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创立现代解释学树立了榜样,但同样也给他们造成了强大的压力。尽管培根的自然解释学最为显著,但是它始终要受到人文主义解释学的节制。同时他也不忘对传统的神学解释学加以创新发展。所有这些都表明,培根蕴藏着丰富的解释学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责任编辑:帅 巍]

①培根《学术的进展》,第32页。

②培根《新大西岛》,汤茜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5页。

③培根《新工具》,第70页。

④培根《学术的进展》,第193页。

⑤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9页。